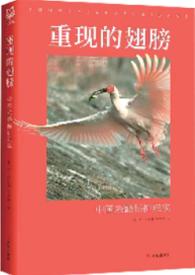


枕边书

安康 书评



近日,著名作家莫仲、韩红艳和齐安瑾历时3年合著的报告文学《重现的翅膀——中国朱鹮保护纪实》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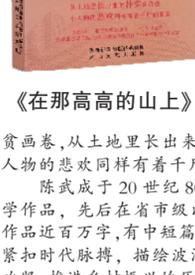
《重现的翅膀》

中国朱鹮的保护史,是一部充满了科学精神和人文趣味的现实传奇,也是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好诠释。朱鹮保护的成功案例,对世界濒危物种的保护具有全球性的实践意义。

《重现的翅膀——中国朱鹮保护纪实》以长达40年的朱鹮保护之路为经,以朱鹮保护过程中丰富生动的事件为纬,全方位全过程地讲述了40年来中国朱鹮拯救和保护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形象地展现出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及朱鹮保护实践的典范意义及中国特色。

三位作家多次深入朱鹮发现地洋县采访,并研读了大量相关资料,从而生动地再现了40年来朱鹮从最初发现时的7只到如今7000多只的复壮之路。全书通过朱鹮研究学者、工作人员以及普通民众与朱鹮之间的精彩故事和交往细节,观照人类与野生动植物群体之间的生命呼应,阐释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展现了世界濒危物种保护的中国特色,讲述了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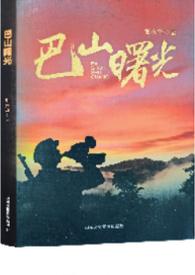
(梁真鹏)



平利县作家陈武成小说集《在那高高的山上》近日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共收录作者近年来创作的脱贫攻坚题材小说20篇,出版推荐语这样评价小说集“一幅鲜活、接地气、精准扶贫画卷,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朴实和善良,小人的悲欣同样有着千钧的重量。”

陈武成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有中短篇小说集出版。该书紧扣时代脉搏,描绘波澜壮阔的决胜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画卷。内容涉及现代产业园建设、乡村旅游兴起、电商物流涌现、“千企帮千村”等,触及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谱写了一曲陇南山腹地的脱贫壮歌。平利县作协原主席、现作协名誉主席黎盛勇赞曰:用小小说家的敏锐,形象记录下一场前无古人的脱贫攻坚壮举!留给后人认知当日事实,以生动鲜活的史料!陈武成的文学功在当下,影响深远!值得充分肯定。

(王莉)



《巴山曙光》这部历史长篇小说叙述的是追剿古长荣顽匪,解放陕南的故事。小说分两条脉络,军长刘锦州、政委章先鋒率领五十四、五十六师赴陕南作战,首战白河、二战关垭子、续战女娲山、决战牛蹄岭,消灭古长荣顽匪4万之众,取得了牛蹄岭大捷,让安康回到了人民手中。小说另一条脉络是“马上”县政府县长李波率领那俊、周仁杰为主人公的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原先是江汉支队在山西抗战的残余部队。后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保护、收留培养,最后委托十八军运回安康的火种。

以那俊、周仁杰的大智大勇,一方面协助李波做地方工作,另一方面协助部队侦察敌情,配合作战。特别在万分激烈的牛蹄岭战斗中,他们扮作国军小分队机智勇敢巧妙的一举端了最顽强的敌军司令部,逼迫周仁杰密切配解放军部队,在安康、旬阳两县的工作,促使安康旬阳、白河两县保安团起义。

作者张永华,男,生于1945年9月,高中文化,岚皋县石门镇人,年轻时学过医,干过三线,近而立之年走上教学岗位,工作中担任校长十余年,2000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2012年在原创文学网站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奇缘》。同年创作并出版历史长篇小说《泰巴奇兵》(西安出版社),以改革开放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巴山之恋》(团结出版社),以解放陕南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巴山曙光》近日由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高桂琴)

悲怆而隐忍的咏叹

□ 陈国庆

石昌林老师,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人,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可谓“物是人非”。现实世界里的石老师,还是曾经的那个人,无论他对工作和生活的热爱,对爱人、女儿以及父母兄弟姊妹的亲情,还是对朋友、同事和乡党的友爱,可谓是“一如既往”,不会因罹患疾病而有所减弱,相反必定会更加炽热、浓郁和深沉。他大病初愈,回到家中,那时的心理上可能不会感到自己多么幸运,而是应该持续在不幸的震惊之中。我们从该书里多处看到这样的心理描述,因此这是一部精神甚至灵魂的升华之书,每每品读,都可厘清人生困惑,或可荡涤俗世烦忧,值得再三细读,慢慢领悟。《时光深处的温暖》告诉我们一条真理:一个人活在世上,一定要用自己的热爱自己的光,要让自己的光照亮自己的生命历程。我虽然对石老师的人生履历并不十分了解,但我相信他的悲怆而隐忍的咏叹,必然会给更加年轻的一代弥足珍贵的教诲,一定可以竭力帮助和抚慰那些不幸而无助的人们,从恐惧而绝望的黑暗中解脱出来,从而体会慈悲与至乐的人而神的高远境界。这部大作,就是由空灵幽深的人性流露集结而成。这是一曲哀伤而催人奋进的咏叹,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是高尚还是平庸。作者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必然拥有对温暖的无限怀恋与执著向往的情怀。温暖不仅是一种自我的生理感受,自我生理感受的不是真正的温暖。真正的温暖来自时光深处,因此它不是经验的、世俗的,如果没有类似

的生命经历,它也可以复制,却可以共情。一般人可以受到主人公故事的感动,却无法从内心深处真正理解“时光深处的温暖”带给人的意外与震惊。当你以为自己认识到了这种温暖的时候,温暖其实已经消逝在了时光深处。这种温暖不是一种沉甸甸的爱的累积,不是人生的必然感受。事实上,它是生活中任何人都愿意承受的悲怆、隐忍和无奈,是生命难以承受之重。静观自然界的云卷云舒,花开花谢;参悟人世间的炎凉悲欢、宠辱褒贬,便更加体认到生命的伟大,生命的可贵。因而,我们要珍惜每一天,过好每一天;让生命无悔,让生命安然。(作者系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慈善研究院院长)

作家 书评

作品的生成与形式的意味

□ 苏云龙

读《寻找雷锋的蕉萍》这本书,我最关注的问题是姚筱舟《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小诗或者说歌词,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件作品的生成原因有哪些。对姚筱舟的现实经历和心路历程未做了解之前,对《唱支山歌给党听》成因的最初猜想仅落脚于此——它是亲历旧社会压迫命运的人对共产党的一种朴素的感恩意识造就的。

读过《寻找雷锋的蕉萍》后才知道,这个成因可能非常复杂:它可能和姚筱舟的家世背景有关,它可能和姚筱舟的切身经历有关,它可能和姚筱舟的精神世界有关——和他敏感、孤僻、自由、浪漫却又善良、柔韧的个性,和他把文学艺术作为消解心中苦闷的手段,和婚后家庭生活暂时安稳、思想世界短暂平静有关。它可能和历史现实环境有关——和旧社会普遍存在的压迫屈辱,和铜川煤矿历史上残酷的霸王窑现象,和作为矿工井下采煤的亲身体验有关。和当时的文学思潮与流行样式有关——和那个时代民歌式的政治抒情诗,和王老九的启发或和王老九农民诗歌之间的相互启发,都有关系。

通过《寻找雷锋的蕉萍》这本书,我了解到《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多重元素交互摩擦、碰撞、激发的过程。在我看来,了解这个生成过程,既可以了解一件作品的前生今世,了解到一个小人物在大时代背景下的不断求索和浮沉悲辛,同时也可以通过与作品及其人物、主题形成特定审视、对话关系,

来获取一些感怀、教益,从而帮助读者完成属于自身的一次内心教育或社会教育。

此外,我在这本书的写法上发现以下特点:一是丰富翔实资料呈现。如书中对姚筱舟各个时期的档案信息、家世信息的呈现,对陕西文学机构、刊物历史的梳理等等。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和谷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基于现实资料和事实依据来呈现,这是由报告文学的属性决定的,也体现了独属于报告文学的现实主义光芒。

二是与我先入为主的印象不同,这本书不是单纯的姚筱舟的传记,它是全景式、全要素式的写作。它通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曲词的生成、词的传播、曲的诞生、歌的呈现、歌的传播等事件、细节,把姚筱舟、雷锋、朱践耳、才旦卓玛、

作家 感悟

聆听生命延续的淙淙之声

□ 姜华

这就我的宿命。今生今世躲不过去,永远无法改变。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已在文学这条小道上奔波了近40载,仍没有步入大道,也未显微弱之气象。愚者终不能悟,让人贻笑大方。

而在创作上,我则进入了一种节奏紧迫与心理平和叠加的状态。也许老了,这些年我对尘世命运万象,山水草木枯荣,骨肉血脉亲情,底层顽强生命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感同身受,不言不休。把它们如实记录下来,仿佛赋予我的终极使命,只要生命尚存,我当责无旁贷。

散文诗是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现代抒情文学体裁。它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写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创作者考察社会和人生背景的感受,注意描写客观生活触发下思想情感的波动和片段。这些特点,决定了它题材上的丰富性和形式上的短小灵活。

进入散文诗批量创作,于我来说是近几年的事。创作之初,小说、散文、诗歌,我都尝试一一涉猎。那时年轻,一是激情,二是为了练笔。后来由于精力所限,除诗歌和散文外,其它体裁的创作基本放弃了。直到2013年秋天,一位散文诗编辑约稿,我才又重拾散文诗创作,谁知写起来竟如破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这些年,我创作的散文诗有1000多章先后在《诗选刊》《星星》诗刊、《散文诗》等国内外80余家报刊发表。《星星》散文诗先后两次在“文本内外”推出我的散文诗组章和人物访谈,《散文诗》还将我的作品在头题加评推出,让人十分感动。这些年,我每天都行走在朝圣的路上。

这也许是我几十年的创作心路。远方像一盏灯,时刻悬在我头上。回忆我的多生,除了平凡就是平淡,如同我写过的那些诗句和文章。古人说,平安是福,

任桂珍等人勾连了起来,形成一个网状结构,共同反映了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命运、群体图谱以及社会生态。

三是作品的呈现不是那种紧凑的情节式呈现,而是用了轻松的笔调、散文式写法。和谷先生是散文大家,散文精神浸透在这部作品中。作品在按照时间线、大逻辑推进的同时,随时自然然而插叙一些背景知识,如铜川的城市背景、霸王窑的故事、关于母爱的议论,以及由新民歌运动而生发地对新诗在新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进行的概述和议论等,这是独属于散文的从容不迫的美学意味。

四是在叙述上有时会有一些复查回环的元素。前面出现的叙述或信息,会在下一次或下一次以不同的样貌重新出现一次。这种复查回环、有板有眼的叙述节奏,让我联想到《诗经》里的复查和《神曲》里三韵句,联想到一些作品里由一个文字符号字构建成的浑圆结构,奏鸣出的婉转韵律。有时结构和韵律、节奏是互通感的,我们在感受作品的内容之外,也可以着重感悟其呈现形式。

但在年轻时,它只是一个梦。记得在乡下生活的300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经常一个人上山去砍柴或去打猪草,一个10岁少年,钻进巴山深处茂密的山林里,一滴鸟鸣,一声兽叫,一股邪风甚至一片乌云,一阵水声都让我惊悚、恐慌、战栗或不安。往往在这时,我一手紧握柴刀,一手从裤兜里拿出一本《说岳全传》来读,只有这样,我狂跳的情绪才会慢慢安静下来。有时突然就想,假如此刻从林中扑出一头野兽把我叼走,也许不会有人知道。但是这样的事件从未发生过。

几十年来,我放弃了很多,但从未放弃诗与远方。就这样坚持着,坚守着,年复一年,痛并快乐着。

被普京称作“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与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成为文学的。”索氏的话语,就是一把尺子。

在我40年的创作历程中,我要感谢的人很多,那些给我创作上提供极大支持、关怀和帮助,谋面或未谋面的领导、老师和文友们,我会永远记住你们,永远记住。而我却无法报答你们,只能以这些尚在赶考路上的文字回赠。

(上接五版)

五

见,我理解不了。我利用铁路工人坐火车不掏钱的方便跑到北京,住在崇外大街一家澡堂子里。骆一禾就在这家澡堂附近,给我谈了3天文学。他反复告诫我:“千万不要去写应时文学,当时的政治需要什么你就写什么,可能红火一阵,过后什么都没有。可以这么说,从现在起再过一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发展的方向都是正确的,中国在文化意识方面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封建和反封建的斗争。”

这3天谈话,给我懵懂的文学思维打开了天窗,对我一生的文学创作极有教益。当时,我不知道骆一禾是和海子齐名的诗人。但是,《冯大家族》没有发表,骆一禾给我的信中写道:“《冯大家族》没有通过,因为近期有一些比较高质量的稿子,把它比下来了。贾平凹《鸡窝洼人家》《正月·腊月》两个中篇,写农村题材的,《冯大家族》就比不过了。三审是编《高山下的花环》的编辑,水平比较高,他觉得你的文字还嫩了一些。而且一个大家族的破灭,当然是在农村生产力提高的过程中瓦解的。但小说没把握好,写改叶爱情力量的作用太大。结果把一场生产力的革命,似乎变成了爱情的力量。这样,社会意义就缩小了,变革也容易了点。”

尽管骆一禾没有发表我一篇小说,但他一直给我通信,十几封近万字,他从文学谈到我的工作、生活、婚姻、身体,无话不说。我调到分局宣传部后,得知骆一禾去世的消息,当时就软瘫在办公桌下,从医院打完吊针出来。我让妻子去买火纸、供香,到汉江边上,面对北京方向,点燃了火纸、供香。

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时,又得到《鸭绿江》杂志刘元举老师的指导。在连续收到100多封退稿信之后,我不敢不怀疑自己是不是当作家材料,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学基础太差,时常萌发放弃写作的念头。就在我准备放弃写作,托人在当地找个待业青年,生儿育女,在山里熬一辈子的时,刘元举把我的一个中篇小说退回来了,附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这样写道:“你是写小说的材料,你一定能够写出大手笔的小说,我相信我的眼睛!”

我拿着信跑到半山,扑在一块大石头上放声痛哭,一直到翌日凌晨一点多钟。从山上下来,我擦干眼泪,又伏在桌前。可以说,刘元举拯救了我的文学生命。在漫长的时间里,我和刘元举书信不断,频繁时一月两三封。1989年,我创作出中篇小说《车帮》,寄给了北京的一家大刊,一位资深编辑给我回信:“杜光辉同志,你用了个很陈旧的方法写了一个很陈旧的故事,建议你多读点书,接

受新事物……”

接到这封信后,我的自信心遭受重创,把《车帮》放在抽屉里半年之久,不敢外投。又不甘心,时常翻出来看,觉得有点味道。终于按捺不住,给刘元举写了封信,写了《车帮》的内容简介,把那个题材的信一并寄去。刘元举回信说,他对那个题材非常感兴趣,务必把《车帮》寄给他。20天后,刘元举回信了:“杜光辉同志,你给我刊写了一篇近年来不可多得佳作。我刊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隆重推出……”

《车帮》在《鸭绿江》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转载了。我终于在文坛上站起来了。《车帮》被《新华文摘》转载后,陕西作家张淑琴推荐给西安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召开会议,把《车帮》列为改编电影的计划,开始寻找杜光辉。人们纳闷了,《车帮》写的是陕西的事情,作者应该是陕西人,能把小说写到这个档次,首次也是省级作协会员,陕西文坛怎么没有印象?

几个月后,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铭在陕西一家杂志社看到我的投稿,已经贴上了退稿笺,何志铭惊喜地说,多少人找了几个月,到底把杜光辉找到了。

何志铭给编辑说了我的《车帮》,编辑赶忙把贴在稿件上的退稿信撕下来,说这篇稿子再看看,这是我在陕西的文学刊物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车帮》在陕西引起了一番轰动,各种赞誉蜂拥而至。著名编剧张子良说:“《车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陕西最好的几部中篇小说之一。”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王吉成看了我的另一部中篇小说《黄帽》之后,给我的信中写道:“从《车帮》到《黄帽》,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陕西出了一个大手笔!”

1991年5月,我作为陕西省青年作家代表,参加第四届全国青年作家会议。我在代表通讯录看到刘元举的名字,立即给刘元举的房间里打了电话。刘元举放下电话就来找我,我们在走廊里相遇,一个作家和一个编辑,在通信10年之后,凭着感觉拥抱在一起。

20世纪的最后几年,文坛已经不是80年代初的文坛了。我邀请刘元举到海南,我们通宵达旦地谈文学。天亮了,我去上班,他看我没有投稿的六七部小说。几天后刘元举问我,这么好的小说,为什么不投出去?我苦笑,没有话说。刘元举明白了,说我把你把这些稿子投出去,挑出一部8万字的《哦·我的可可西里》,说这部小说发表了,肯定会轰动,当下就给《小说界》的编辑修晓林打电话。小说发表后,先后获得上海长中篇小说

说大奖、首届中国环境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2000年—2001年优秀中篇小说奖,入选《新世纪小说大系》,使我的创作又提升一个档次。到了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刘元举又把我的中篇小说《多多》,推荐给《北京文学》,《北京文学》连续5年都发我一部中篇,使我的创作又提升一个档次。

六

一次出差,我坐在卧铺车厢,对面坐着两位青年,拿着转载我《车帮》的《新华文摘》,一个给另一个说,你看看这篇小说,过去吹马车的都知道咋教育孩子,现在的家长太溺爱孩子了!

《车帮》里有段这样的细节,车户为了培养孩子的胆量,把烟袋放到乱葬坟里,让孩子半夜去取……

和我同行的人给他们说,他就是杜光辉。人家不相信,说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同事让我拿出工作证。

他们给我说,你写的这个小说太震撼了,我们从西安出发就看看,看了一路,感慨了一路。到了安康,我们请您吃饭……

这两个人,一个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编辑宋小平,一个是中学语文老师张广孝,我们由这篇小说成了好朋友。

我突然有了这样的感慨,我的思想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这难道不是写作者的成功?2021年,我参加中国作协的评审会,会后与北京的文友相聚。做东的人介绍我时,一位大刊的主编说,我读你文章的时候,您是《新世纪》的主编,您发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认真研读,那时就立下决心,毕业后当编辑。

真没想到,我写的文章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几十年过去,我逐渐明白一个道理,无论在多么艰难的困境,只要自己不抛弃自己,这个世界就抛弃不了你!阅读:是先哲们给我们的教诲。写作:是我们给世界的发言。文章写到这里,总找不到合适的结尾,就读书。读到陕西作家周瑄璞读美国作家杰·伦敦的《马丁·伊登》的感受:“整个社会像个体积庞大轰轰作响的机器,绝不会为一个无名青年而停下来,让他这个小零件跻身上去,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地方虚位以待,到处都是人满为患。你必须学会在这个机器的运转中掌握一种合适的速度,跟上步伐,伺机将自己这个小零件拧到位置上。”这段文字权当结尾。